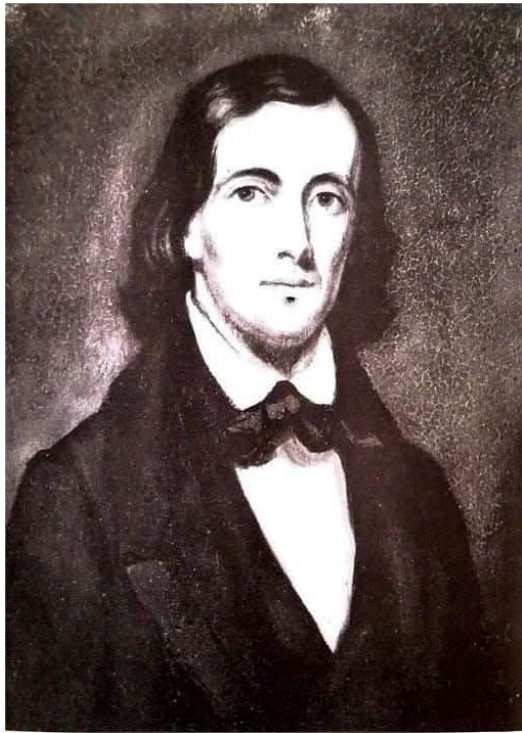


经典

钱宁：“若我的帆沉了，它定是去了另一片海”

□杨靖



威廉·埃勒里·钱宁

1850年，霍桑在小说《红字》引言“海关”一文中谈及启发他创作灵感的几位友人，其中包括智识之士、影响“微妙”的爱默生，隐居茅屋、醉心于印第安遗迹的梭罗，以及和他一同在篝火旁“纵情狂想、忘乎所以”的钱宁。无独有偶，四年之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也曾描述“一位诗人，一位朋友，从遥远的地方，走过最厚的积雪，冒着最凄冽的风来到我的林中小屋”——据考证，这位诗人乃是霍桑、梭罗和爱默生共同的朋友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 1817—1901)。

钱宁出身于波士顿名门，他的父亲是哈佛医学院教授(后兼任院长)，母亲来自于富商珀金斯家族。钱宁的显赫家世可追溯至其曾祖父——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钱宁的伯父是唯一神教牧师威廉·埃勒里·钱宁(通称钱宁博士)，故而诗人又被称为威廉·埃勒里·钱宁二世(或埃勒里·钱宁)。他另有一名叔叔担任哈佛修学教授。钱宁的母亲亲属非富即贵，在波士顿商界和司法界人脉深广。

钱宁早年就读于波士顿拉丁学校，他天资聪颖，成绩优异，家人对他寄予厚望。然而，1823年，母亲突然病逝，成为钱宁一生的转折点——他本人再也没能从这一创伤中恢复过来。多年后，谈及童年经历，钱宁仍称母亲遽尔离世为他一生中最为惨痛的经历。据传记作家罗伯特·N·赫兹佩思推断，这也是导致钱宁成年以后性格“喜怒无常、固执己见”，“意气用事、缺乏自控力”的根本原因。1834年，钱宁进入哈佛大学(比梭罗晚一年)，但不久便宣布退学。据他本人声称，退学是因为哈佛缺乏“真正的学者”，尤其缺乏诗人：他们太过肤浅，而且自命不凡。但真实的原因是他旷课太多，学分严重不足，面临被开除的风险。或许为保存父辈颜面，他决意远离哈佛，远离波士顿，打算从此做一名真正的行吟诗人。

1842年秋，钱宁与超验主义者玛格丽特·富勒的妹妹埃伦(Ellen)结婚。在爱默生感召之下，夫妇二人移居康科德，与霍桑为邻。考虑到钱宁夫妇的经济压力，富勒向霍桑提出能否让他们暂时借住在老宅(Old Manse)，待寻觅到合适住处后立即搬迁。作为答复，霍桑写下了也许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富“诗意”的婉拒信：“如果有人建议亚当和夏娃接受两位天使寄宿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是否会欣然同意——我深表怀疑。”

钱宁时常和好友梭罗一道徜徉山水。康科德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山林，尤其是林间水平如镜、缓缓流淌的河流最能激发钱宁灵感，催生出无数美妙诗行——“一时兴起的梦想有时以中世纪浪漫感伤的形式呈现，浑如将济慈和斯宾塞融为一体……开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先河。”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ell)所言，倘若钱宁“生在斯宾塞或德莱顿时代，他一定能成为‘诗人中的诗人’”，在诗坛大放异彩——因为他拥有一流诗人的头脑，同时也不失诗人“雅致的疯狂”。

梭罗对钱宁的诗艺极为推崇，曾称赞他的诗作“辞致雅赡，行文不羁”，并将他誉为“康科德诗人”。同样，爱默生读到钱宁的自然诗也喜不自禁——其中《船歌》最后一行“若我的帆沉了，它定是去了另一片海”意蕴深沉、哀而不伤，堪称康科德俱乐部诗歌的典范之作。1843年7月，超验主义文学期刊《日晷》上刊载一则广告：“《诗集》，威廉·埃勒里·钱宁著。波士顿，1843年。”题头下方是杂志主编爱默生撰写的推荐语：“如前所述，我们很敬仰钱宁先生的天才。就诗作某些特点而言，即便本国最优秀的诗人也无人能够与他匹敌。对于大多数诗歌爱好者来说，这部诗集已经成为鼓舞人心的希望之所在。作者为人真诚，思想高尚，正如他的遣词造句——新颖精致，不同凡响。”

钱宁恃才放旷，向以“名士”自居，可惜无力谋生，只能仰仗亲友接济。有意思的是，钱宁对于爱默生等友人的捐助从来都是“欣然领受”，也从未打算偿还，认为这是“天才在世上应得的礼遇”。而爱默生等人出于对天才的呵护与崇敬，对钱宁即便是心血来潮的计划也大力襄助，或许更助长了他的“戾气”。定居康科德不久，钱宁突然感到自己“诗才枯竭”，情绪低落，于是向爱默生提出他打算去意大利小住一年：一面增进健康，一面搜集素材。爱默生一如既往慷慨解囊，并号召一班文友齐心协力资助诗人远游。一番操作后，如钱宁所愿，共募得500美元——在当时这是中等之家一年的生活费用，然而钱宁短短几个月便将这一笔钱花得精光，而后一身轻松返回康科德，令众人大跌眼镜。

钱宁与朋友交往一向我行我素，特立独行。比如，他从未像爱默生等人一样，将收到的信件“分批”归类保存，以作纪念或写作参考。相反，他习惯于将“收到的友人书信扔进炉子，或用来引燃烟斗和蜡烛”。再比如，他恪守伊丽莎白时代文人的传统，即诗文只适合在同好中私下流传，公开发表则近乎“耻辱”。在爱默生等人怂恿之下，他“勉为其难”地出版诗集，但很快又追悔不已——因此，有一段时间，他频繁“出没于波士顿大小书店，将自己的‘作品’统统买下，然后全部烧毁。”

继《日晷》刊载钱宁处女作《诗集》广告后，爱默生又接连发表数篇评论，对钱宁诗歌给予高度评价，其中《新诗》一文收录钱宁诗作12首，可见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作为康科德文学圈的长者，爱默生在一则诗论盛赞钱宁是超验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钱宁是一位自然主义者，以诗人的好奇和敬畏之心看待花鸟——他不去数金雀花的花蕊，也不去数木犀鸟的羽毛，而只享受它们所唤起的惊喜和爱慕。”

对于爱默生的美誉，钱宁也投桃报李。他在书信体自传《诗人与画家的青春年代》一文中模仿爱默生的口吻写道：这个世界需要“一些真正来自大自然的诗人，他们走进自然，不是去看树看日落，把它们写进笔记本，而是不由自主地写下关于它们的诗句，在追求完美的严苛之美前，吐露内心，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我已对近期平淡乏味的诗歌失去耐心”——闻听此言，爱默生益发将这位画家兼诗人引为同道知己。

不仅如此，钱宁在书中还谈及他如何成功克服教育和社会强加给他的桎梏(从哈佛“退学”)，以及如何通过刻苦自励和不懈努力最终在诗坛卓有建树。显然，这一话题最能引发爱默生的共鸣：他对哈佛陈旧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深恶痛绝，曾在演讲中号召美国学者打破权威、自主创新。爱默生的激进思想令哈佛当局大为不快，此后29年间，爱默生与哈佛校园“绝缘”。

《日晷》杂志倒闭后，爱默生多方联系出版商，为钱宁诗作发表另辟蹊径。1844年，《礼品：圣诞节和新年礼物》由费城凯里出版社发行，其中收录钱宁的《沙漠》《意大利画家之歌》(发表时被爱默生改为《意大利之歌》)和《士兵的坟墓》，以及爱默生本人的《植物园：日记一页》一诗。为舒缓钱宁的家庭困难，爱默生雇用钱宁妻子担任女儿的家教，雇用钱宁劈柴，并延请他协助编选诗文集。不仅如此，爱默生还不辞辛苦，替钱宁修改、润饰诗稿，与出版商联系出版爱默生、钱宁诗文《合集》，并恳请出版商将稿酬全部打给钱宁。出乎意料的是，年轻诗人不愿依附驽尾，他在信中回复道：“借着您的盛名出卖我自己，这一做法恕

我不能苟同。”

此外，每当钱宁新作问世，爱默生必定将其作品寄赠各方友人，扩大其影响力。比如当他的好友老亨利·詹姆斯(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之父)前往英国游历之际，爱默生请他捎带一部钱宁诗集赠予托马斯·卡莱尔：“亨利·詹姆斯去拜访您，同时带去我的一封信。他带着W·埃勒里·钱宁的诗集给您。钱宁是我的朋友和最近的邻居。读后请您不吝赐教。我确信他将作为诗人，您肯定能发现他具有这样的天赋。”

平心而论，1840年代钱宁在文坛声誉鹊起，除了自身的天才和努力，很大程度上与爱默生的奖掖与敦促密不可分。爱默生希望这位“门徒”能够善用资源，精心打磨诗艺，并且能够像他本人一样在文学市场大获成功，然而事与愿违，他的满腔热忱很快变成了不满和失望。

爱默生为人严谨，著文也是一丝不苟。担任《日晷》主编期间，他对稿件要求精益求精，时常在开机印刷前，又将文稿撤回修改。对于钱宁诗文中漫不经心的单词和标点错误，一开始爱默生耐心为其校改，并再三告诫他“小处不可随便”。但钱宁对此置若罔闻，在他看来，作诗最重要的是灵感，其余皆为细枝末节，不必在意。钱宁为人一贯不拘小节，据友人说，某次演讲海报上，钱宁忘记标注地点，害得友人接连扑空，赶至第五个会场，才发现他所在的报告厅——可惜此时演讲已经结束。甚至在引用他自己的诗作时，钱宁也会出错，越发坐实爱默生对他的“指控”：不讲求文法。

钱宁自恃学问高深，好用大词(因其曾编纂《生僻词典》)，务求翻空出奇，令爱默生尤为恼火。哈佛名教授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在致爱默生信中曾提及钱宁诗集《离家未远》(1858)，在复信中，爱默生写道：“我有些犹豫要不要把钱宁的书给你。我发现他在写诗时犯了许多不可饶恕的过错，他的创作疏忽大意而又前后不一。看起来他好像把自己在树林中用铅笔匆匆写就、以便自用的一沓便条，直接寄给了印刷厂。就连一个学生都可以校订那些作品……”在这一点上，梭罗与爱默生所见略同——梭罗认为纠正钱宁散漫不羁文风的绝佳之计便是逼迫他“用拉丁语进行写作，如此一来，他便会迫不得已下笔谨慎，并且需要随时查阅字典，以求文法正确”。

或许正是存在这样的瑕疵，导致钱宁在文学市场始终不温不火。他的艺术评论集《罗马谈话》(1847)出版后无人问津，被出版商原封不动退回。有学者认为钱宁在文学市场“遭遇失败”，除了他个人及家庭原因，爱默生及超验俱乐部也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劳伦斯·比尔甚至作出大胆假

设：如果身处纽约文学界，钱宁可能会比在康科德更为乐观开朗，也可能取得更大文学成就——他善于观察且胸怀大志，一直想要以“塞万提斯和拉伯雷的风格”创作一部针砭时弊的小说，可惜未能如愿。事实上，在康科德，始终是布道风格的“严肃”文学一枝独大。因此，作为一名爱默生式严肃审慎的诗人，钱宁极力压抑内心豁达明朗的真性情，由此变得日渐沉闷和怅惘。

与钱宁相反的事例是梭罗，《瓦尔登湖》的出版宣示了文学家梭罗的自立，但同时也宣告了爱默生/梭罗文学师徒关系的结束。爱默生至死都难以宽宥梭罗的“自立门户”，哀悼(实为暗讽)他本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结果却做了“采摘越橘的小队长”。但正如评论家所说，梭罗的成功之处恰好是钱宁失败的地方——钱宁盲目崇信爱默生，终身未得解脱。钱宁的错误在于“过分拘泥于爱默生文学教诲的字面意义”。

1850年代超验主义运动式微后，钱宁与包括爱默生在内的康科德友人日渐疏远。1855—1856年间，他曾短暂供职于《新贝德福德水星报》，担任编辑，但始终无法适应一份正式工作的要求，不久怏怏而返。1873年，钱宁代表作《梭罗：自然主义诗人》面世，爱默生发现书中竟收录自己从未公开发表的诗作，大为震怒。受到爱默生冷落后，钱宁极度沮丧。他在康科德唯一的知己梭罗之死更令他伤心欲绝。不久，在桑伯恩等人的鼓励下，钱宁出版诗集《漫游者》。诗作刻意模仿新古典主义风格，用词典雅，充满学究气，甚至为凑韵脚而采用倒装句式——与青年时代崇奉的超验主义诗歌信念背道而驰。按照时人的一致看法，此时钱宁早已失去当年吟诵《船歌》时的俊逸风采，“泯然众人矣”。

1882年4月一个早晨，钱宁突发奇想，前往爱默生家中拜访。年迈的爱默生非常开心，不禁老泪纵横。当晚，爱默生病逝。钱宁在康科德的故交唯余康科德学校校长桑伯恩。1901年圣诞前夜，钱宁逝世。桑伯恩致悼词，以诗人最爱的《船歌》结尾：“若我的帆沉了，它定是去了另一片海。”——对康科德文学圈而言，钱宁的《船歌》或许代表了超验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从这个角度看，正如劳伦斯·比尔在《文学的超验主义》一书中所说，诗人钱宁的文学生涯需要“重新加以衡量和评估”，否则很难取得对于超验主义文学运动的全面了解和把握。

钱宁被安葬于康科德“睡谷公墓”(Sleepy Hollow Cemetery)的“作家岭”(Author's Ridge)，这也是梭罗、霍桑、爱默生等人栖息的墓园——钱宁的坟墓就在邻人霍桑对面，离他的知交梭罗不远。

一个昂首离开战场的人

——读海明威短篇小说《在山梁下》

□小二

被誉为美国现代文学开山之父的海明威在短篇小说上的成就可以说是超群的。很多著名小说家被人记住的短篇小说往往只有一两篇，如菲兹杰拉德的《重返巴比伦》，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雪莉·杰克逊的《彩票》，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好人难寻》和杜鲁门·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而被评论家称作名篇的海明威短篇小说多达十余篇，除了读者比较熟悉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杀手》《白象似的群山》《在异乡》《印第安人营地》和《大双心河》外，还有《我老爹》《没有被打败的人》《雨中的猫》《士兵之家》和《桥边的老人》等等。根据1975年出版的《海明威短篇小说评论集》编辑者杰克逊·本森的粗略统计：到1968年为止，海明威的短篇共被各种短篇选集(不包括他自己的短篇集)收录了410次。

海明威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战争题材的小说在他作品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包括《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这两部长篇和多达十篇的短篇小说。与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短篇小说包括《在异乡》《大双心河》《你们绝不会这样》《士兵之家》《此刻我躺下》。而包括《桥边的老人》和《在山梁下》在内的五篇短篇则与西班牙内战有关。

除了被收入海明威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短篇全集《49个短篇小说》里的《桥边的老人》，海明威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短篇小说被评论界谈论得相对较少。《桥边的老人》是作为记者的海明威报道保皇党撤退的电报稿。当时海明威正好欠《时尚先生》杂志下属的《视野》杂志一份小说稿件，所以他把那份电报做了几处小改动，如把三只猫改为一只，把老人的年龄从68岁改成76岁，又增加了几段对话后直接发给了《视野》。这篇也成为海明威生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里的最后一篇。而《在山梁下》等另外四篇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小说，海明威生前只在杂志上发表过，直到1969年才收入由他的第四任太太整理出版的《第五纵队和四个西班牙内战短篇》中。评论家们公认《在山梁下》是这四篇小说中最好的一篇。海明威在写给他的编辑马克斯·珀金斯的信中说宝琳(他的第三任妻子)认为这篇小小说是他写得最好的短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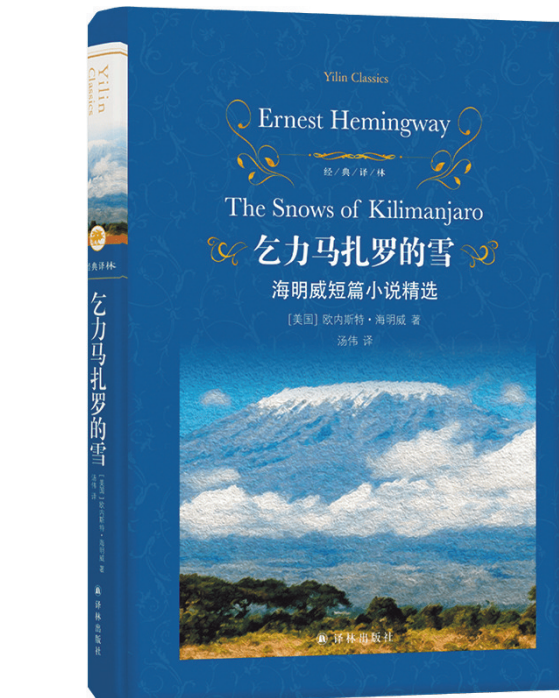
为了便于理解《在山梁下》这篇小小说，先简单介绍下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内战(1936年7月18日—1939年4月1日)发生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奏。对阵一方为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扎尼亚的共和政府军与人民阵线左翼联盟，另一方是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为中心的西班牙国民军、长枪党等右翼集团；共和政府军

受到苏联和墨西哥的援助，佛朗哥国民军有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和葡萄牙的支持。英法美等国(包括中国)虽然保持中立，但由民间人士组织的“国际纵队”则前往西班牙加入左翼联盟阵线参战。

《在山梁下》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作。叙述者是来前线拍摄国际纵队进攻影片的记者，当时海明威与“北美报业联盟”签约前往西班牙报道战事，他还与荷兰电影导演、第三国际行动人员尤里斯·伊文思合作拍摄反映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西班牙的大地》。所以这也是海明威的真实经历。小说描述了由国际纵队主导的一场进攻战。小说以他和摄影师一起从战场撤退到山梁下开头，他们与作为预备队的西班牙士兵一起待在战壕里等待发起总攻。海明威对场景的描述简洁生动，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发起进攻前繁忙的后方。通过叙述者的描述读者意识到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进攻。作为进攻方的我们火力不够，“当需要四十门排炮的时候，我们却只有四门。”(他)只有一个旅，却出乎意料地接到发起攻击的命令……这么做至少需要一个师的兵力。”小说通过“我”亲眼目睹和与西班牙士兵交谈得知的几个事件，讲述了这场不成功的进攻中那些不会被记录在案的故事。小说以“我”和摄影师“沿小路下山，去搭乘去马德里的指挥车时”，看见了那个被督战队击毙在山梁下的法国逃兵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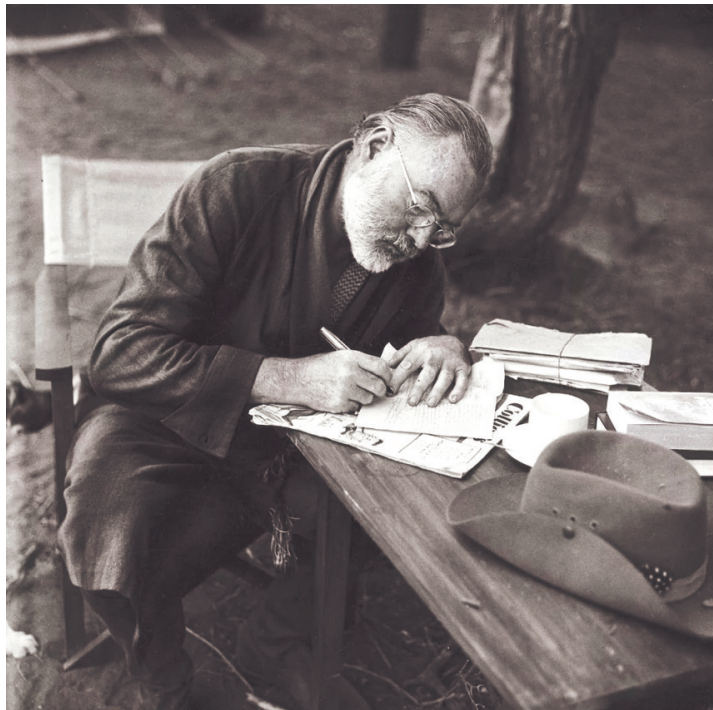
海明威描写战争的短篇大多表现战争对个人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在异乡》《你们绝不会这样》《此刻我躺下》)，以及如何从战争的后遗症中康复(《大双心河》《士兵之家》)。但在《在山梁下》这篇小说里，海明威第一次探讨了战争的本质和意义。通过叙述者与作为预备队的几位西班牙士兵的对话，海明威对战争的本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结盟关系提出拷问。在西班牙士兵眼中，现在支持西班牙政府的盟国都是曾经的侵略者，“在巴达霍斯，英国人和法国人掠夺洗劫我们，侵犯我们的妇女。”“我父亲是被古巴的北美人杀害的，他在那儿被强征入伍。”

以硬汉著称的海明威擅长描写人们面对死亡和危机时表现出的勇气、决心和坚毅，如《没有被打败的人》里与公牛决斗到死的斗牛士，《老人与海》里与大马林鱼搏斗了三天、最后只带回家一副大鱼骨架的老人。但在《在山梁下》这篇小说里，他却塑造了一个擅自离开前线的逃兵。那个法国士兵隶属于国际纵队，当年肯定是怀着满腔热血自愿来西班牙参战的。当认清自己的付出和牺牲毫无价值时，他毅然决然地昂首离开了战场。由于叙述者“我”曾经“身处尘土、硝烟和枪炮



声中，身处受伤、死亡、对死亡的恐惧、勇敢、怯弱，以及不成功的进攻带来的失败感和荒谬之中”，所以能够理解“死于一场不成功的进攻是多么愚蠢”。小说的叙述者一直用符合新闻记者身份的客观视角观察事物，他虽然亲临战场，但并没有介入到战斗中。他一方面承认战场上督战队存在的必要(“战争中必须遵守纪律”)，另一方面又被督战队的残暴(枪杀帕科和追杀法国中年逃兵)所触动，无法调和战争中“遵守纪律”和“个人的生存愿望”这一悲剧性的辩证关系。而这样的悲剧场面是不会出现在他们正在拍摄的记录战争的影片里，电影里“它们(坦克)势不可当地冲过山丘，像大船一样登上山顶，朝着我们拍摄的胜利的幻影叮叮当当地驶去”。

《在山梁下》这篇不足八千字的短篇里包括了时空上的多次转换。小说描述的是一场即将开始的进攻，这也是叙述者此行的目的：记录这次进攻。借助叙述者“我”与西班牙士兵的对话引出了帕科被督战队枪杀这一残酷的事件。小说还讲述了这场进攻失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法国的坦克指挥官



海明威

为进攻壮胆喝醉了，最终因为喝得太醉而无法指挥。酒醒后他会处决。”“他(国际纵队的指挥官)却没能遵从他自己的忠告，因为两个月后他就把命给弄丢了。”小说中充满了戏剧性的翻转：害怕战争而自杀的帕科在认清自己的软弱后，却被督战队枪杀；自愿参战、最终不愿死于一场准备不足的战争的法国人，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了我方督战队的手里；告诫叙述者“别把命给弄丢了”的俄国军官自己却于两个月后丢掉了性命。作家和诗人韦恩·克瓦姆认为《在山梁下》是一个“关于作家如何写小说的小说”。克瓦姆的分析从作者“对地点的敏感”出发，这不仅是对物理场景的敏感，还包括对场景中其他人物的道德或情感位置的敏感，作者借此获得了对人性的理解。

在小说的结尾处，那个中年法国人是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战场的。因为他“突然看清了一切，看清了这场进攻的无望，看清了这场进攻的愚蠢，看清了这场进攻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可能不是因为惧怕，而只是因为看得太清楚了”。《在山梁下》里的中年法国人与《没有被打败的人》里的斗牛士不一样，因为斗牛士自始至终都认为己方能够战胜对手。他与《老人与海》里的老人圣地亚哥的心理状态也不一样。因为老人面对的是必须取胜才能生存下来的战斗。而《在山梁下》里的法国士兵面临的是一个确定的失败，确信自己将“死于一场不成功的进攻”，所以他昂首退出了战场。